

● 作者/Paul Kreitman ● 譯者/余振國 ● 審者/洪琬婷

迎戰新冠肺炎

Going to 'War' Against Coronavirus

取材/2020年3月25日外交家網站專文(*The Diplomat*, March 25/2020)

在這個前途黯淡的時代，與病毒「抗戰」似乎常常被掛在每個人的嘴邊。首位使用新型冠狀病毒(Coronavirus，以下簡稱新冠肺炎)乙詞的世界領導人是習近平，他在2月初就呼籲中共要進行一場遏制新冠病毒的「人民抗戰」。隨著新冠病毒散播到中國大陸境外，其他領導人也呼應了他的說法。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告訴法國人民：「我們正在打仗。」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籲請英國公民重拾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的「大轟炸精神」(Blitz Spirits)。曾閃躲兵役且個性浮誇的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更自稱是「戰時總統」。

但過去的戰爭史中究竟有何經驗教訓可供師法，來幫助人類進行這場對抗新冠肺炎的戰爭呢？二戰時相關工業全面國有化，以及各國政府大力支援經濟，此類措施與當前情況相似。但是戰時社會常見特徵之一：總動員，各國相關討論到目前為止卻乏人問津。二戰期間，包括中共和日本在內許多國家，都採取了激烈方式來重組其社會制度；不僅徵召士兵參戰，並且實施全國總動員，緊密結合國家與社會。為了持續支援戰事，這些國家除了由上而下傳達命令或激發人民愛國主義之外，還動員國內社群成立民間團體，並透過道德勸說甚至強制執行來塑造公眾行為。

這些民間團體形式多樣，本文僅概述其中少數幾種形式。其中最顯著是二戰中所有參戰國為了預警空襲都投入了龐大的資源。降低空襲傷亡被視為至關重要，這不僅是為了保護全力投入彈藥生產的工人，也是為了維持後方國內士氣。地方層級的空襲預警措

戰爭時後方總動員對支援作戰大有助益，當前各國對抗
新冠病毒疫情亦可採取類似模式，兩者應可相互借鏡。

施是由各專門委員會負責建造和維護防空洞、進行疏散演習、消防滅火、傷患急救，甚至還負責密集監視人民動向。由當地任命的值更人員定時巡邏，嚴格維持夜間燈火管制：確保民眾家中窗簾是否以膠帶封好避免透光，並盤查任何甘冒危險在街上攜帶火把，或裝置自行車燈照明的莽夫或叛徒。在某些情況下，就算是在晚上戴著眼鏡抬頭看一眼天空，也都足以讓你受到警告。

中國大陸是最早受到大規模空中轟炸的國家之一。在抗日戰爭(1937-1945年)爆發後不久，日軍轟炸了上海、南京和廣州等許多城市，企圖迫使國民政府投降。當國民政府向內陸轉進時，日本轟炸機緊隨其後，先是轟炸武漢，再來是其戰時首都重慶。1938年到1943年之間，重慶先後遭到200多次空襲。

為因應這些次數前所未有的轟炸行動，國民政府採取諸多作法。首先，其建立了一個由無線電、警報器、手旗和寺廟鐘聲組合而成的戰時空襲警報系統。儘管戰時重慶的防空洞通常只開放給權貴，但空襲警報

確實為其餘老百姓爭取到逃離城市的寶貴時間。國民政府甚至組織了多達8,000人的城市消防隊，盡可能降低轟炸所造成的損害。

日本政府在這方面的準備比國民政府要更加澈底。其在入侵中國大陸後不久即實施了一項防空法，要求地方成立委員會，以執行燈火管制、消毒、防毒氣攻擊等反制、疏散和救濟等作為，並協助進行監視、溝通和警告等措施。戰時文宣當時一再強調眾人須全力合作才能有效執行，如戰爭初期某張海報宣導內容寫著：「讓我們一起守護家園。」事實上，日本的空襲預防措施的確相當有效，並且一直維持到戰爭的最後幾年。儘管這些措施最終依然不足以阻止盟軍以燃燒彈轟炸城市，並導致城市居民大規模逃往農村。

戰爭期間，各式民間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日本(以及同時期英國與德國)的鄰里互助會派出家庭主婦，挨家挨戶宣導節衣縮食，並鼓勵人民用積蓄購買政府戰爭債券。這樣做有兩個目的：一是能為軍火工業

提供資金，二是提倡愛國與團結，使人民感到他們確實有為戰爭出錢出力。令人遺憾的是，日本戰敗後這些債券因惡性通貨膨脹而失去價值，使得持有民眾的血汗錢付諸流水。日本政府為了迫使民眾，主要是婦女，能節約開支、少用奢侈品並且重複使用衣服和紡織品，也施加類似壓力。戰爭接近尾聲時，日本政府甚至勸導居民捐獻家中的鍋碗瓢盆，熔化後成為零式戰機的製造原料。

戰時民間團體在提供醫療服務和維護公共衛生方面，也發揮了關鍵作用。國際紅十字會各國的分支機構，指導地方分會招募並且訓練護理人員，並協調分配從後方到前線戰場的醫療物資。居住在新加坡和美國的海外華僑也充分展現了總動員的精神，他們為支援前線的戰傷士兵，發起了跨國銀行募捐活動。在日本，後方動員協助清理人類排泄物。當時東京的糞便收集系統崩潰了，故鄰里互助會排定了輪值表，讓居民輪流清理廁所，並將糞便傾倒至地下道與附近的河流。

自戰後時期以來，這些民間



2020年初，全世界都在進行一場對抗新冠病毒的戰爭。(Source: AP/達志)

團體大多完成轉型並繼續運作。諸如現今監管日本醫療保險體系的厚生勞動省，就是成立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其戰後重建時期，鄰里互助會依然繼續推動公共衛生，提倡以「科學方式」養育子女並以「理性方式」消費等節儉觀念。迄今，日本家庭資源回收還是由義工組織管理，以落實垃圾分類。

中國大陸自戰時總動員發展而來的組織，其影響力也是這幾國中最顯著者。在抗日戰爭初期，國民政府成立了資源委員會，以指導煤礦、鋼鐵廠和製

藥公司等關鍵產業來生產戰爭所需物質。此委員會在二戰結束後以幾種型態被保留下來，並在臺灣和中國大陸協助制定了產業政策。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這些單位成為日常運作必須之基本架構，但實際上是先前國民政府戰時動員留下來的產物。而中共後用於動員對抗日本與國民政府的勞動人民手段，同樣是淬煉自戰爭中，如同蘇聯在內戰時逐漸形成其階級制政黨結構。

人類應如何從戰時總體動員的歷史中獲致經驗來對抗今天

的新冠肺炎呢？實際上，過去有許多方法可在今日派上用場。中共在對抗新冠病毒的初期，為了要將病毒控制在最早出現的湖北省，號召了許多民間團體，最主要是黨員幹部網絡。此網絡自社會菁英階層調派人員，分派前往政府機關、國有企業、工作單位，甚至是私營企業。這些黨員幹部負責全面督導衛生控管措施，並由招募來自當地社區著制服的義工執行。中國大陸人民必須在進入公共汽車站、商店、餐廳以及社區時接受體溫檢測。任何體溫過高

的人都會被送往當地的新冠病毒檢疫中心，而被檢測出陽性反應者，隨後會被隔離在徵收作為治療中心的鄰近飯店、體育館或體育場中。患者不能選擇自家隔離，因為中共已評估自家環境會是病毒傳播的主要場所。正是這些控管措施，而不僅只大規模封鎖整個都市或地區，有效遏制了疫病傳播。

在其他國家，此類民間團體同樣可以發揮抑制新冠肺炎傳播的作用。採行此法無疑會引起許多人的反感，但是如維

持社交安全距離作法，數月後將造成龐大的經濟損失、社會不穩及民眾不滿。故包括美國總統川普、新聞記者佛里曼(Thomas Friedman)，甚至義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等人，來自各個政治領域的聲音已經暗示此作法將面臨難以承擔的後果，因一國強制執行保持社交安全距離作法，會需要參考傅柯式圓形監獄機制(Foucauldian mechanisms of surveillance)理論來執行。此外左派人士本能上就會

去懷疑任何帶有軍國主義色彩的事物，特別是當此手段可能會賦予獨裁者更多權力。而右派人士通常不願從像中共這類信奉列寧主義的威權國家汲取任何經驗教訓。無論如何，兩者都會將總動員視為自由開倒車的舉措。

事實上，戰時國內後方動員往往造成一個令人不快的局面。利用民間團體來監督公眾行為，不是只有把權力賦予有責任感的公民，也無可避免將同樣權利，賦予某些好管閒事者

加拿大餐廳發揮深富創意的巧思讓民眾保持社交安全距離。(Source: AP/達志)



又恃強欺弱者，讓他們有機會逞威。戰時日本，年老體弱而不能參戰的人通常自願參與服務，他們步履蹣跚，在擁擠的火車車廂裡，用擴音器要求大家不要推擠。你我可能都認識幾個如此熱心公益的人，不同的是，這次他們改成攜帶額溫槍在街上巡邏。

但現在全球已面臨瀕臨絕望的時刻，如各國無法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傳染，可能會使全球衛生機構不堪負荷，造成數百萬人生命流逝。反過來說，如果各國成功抑制疫情，充其量只會再讓疫情持續流行約一年左右。為達成此目標，大多數人須持續幾個月保持社交安全距離。迄今大多數民主國家都不願意效仿中共的管制作法；相反地，許多國家要求其人民執行居家檢疫。英國首相強生在宣佈實行全國封鎖時談到，他希望每位民眾對抗病毒的動員方式就是「待在家裡」。事實上，「社交安全距離」本身就帶有要人民減少社會參與的含意。

民主國家未採用類似戰時動員措施，而採用了從上到下的措施(關閉學校、酒吧、飯店和大型聚會場所)，並且敦促國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這麼做可能還不夠；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連待在家裡幾天都不願意，更不用說在家等上幾個月，等到抑制病毒的抗體問世再出門了。再者，民主國家安全部門欲強制執行如保持社交安全距離這類繁複的工作，而不仰賴鋪天蓋地且在危機過後依然為之的數位監控作法，其當前人力是否足夠？

進行國內後方動員，應可在自由放任主義與國安部門全面封鎖這兩極端間，找出折衷方案。諸如多數人寧願讓頤指氣使的鄰居量測體溫，也不

願讓機器人或穿著制服的陌生人測。而地方民間團體可與亟需幫助的人相互支援，同時維持當地長期對抗新冠肺炎的士氣不墜。再者，儘管戰時動員組織已永久成為中共和蘇聯的一部分，但在民主傳統悠久的國家中，這些組織在戰後大多遭解散或恢復至原有狀態，現今在日本和德國監督資源回收的社區義工組織，可說是前人遺緒。

假設民主國家決定進行總動員，那麼他們還有很多準備工作要做。因多數民間團體不再擁有戰時和戰後時期的會員數。至1980年代後期，各國政府仍可指揮童子軍、扶輪社、退伍軍人協會，鄰里守望隊甚至保齡球聯盟來實施上述措施。但是在過去40年間，這些組織會員數急劇下降。正如社會學家普特南(Robert Putnam)所觀察到的那樣，現在大多數人都是單打獨鬥；從這方面來看，新冠病毒已經領先人類許多。

儘管如此，人類還是可以懷抱希望。戰後迄今仍保有許多民間團體，就算其規模僅剩基本組織架構，也肯定會非常樂意接受新成員。對於那些在學校關閉後不知如何安置孩童的家長來說，童子軍顯然是個好去處。即使在民間團體已解編的國家，人民也可期待社區中建立新機構來因應當前新冠病毒危機，讀者甚至可以當仁不讓，帶頭開始。總結來說，如果想長期保持社交安全距離，大家必須團結一心。

作者簡介

Paul Kreitman助理教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廿世紀日本史。

Reprint from *The Diplomat* with permission.